

参加抗日和解放战争片断回忆

高云清 口述/高根离 整理

我叫高云清，原名高长松，1923 年出生于长葛市坡胡镇大刘庄村（1951 年前归禹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旧社会全家人靠讨荒要饭度日，小时候上不起学，16 岁那年被抓丁。1942 年加入抗日游击队，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1954 年转业回乡。在部队作战勇敢、数次负伤、多次立功授奖，这些经历距今已半个多世纪，我本人没有文化，对过去打仗的详细情况难以记清，现就本人记忆口述如下。

抗日战争

1939 年 7 月被抓丁当兵，在唐河县砖桥受训一年多，编入李宗仁部七十四师小孩连。我们连负责往湖北押送军粮，一个班八个人押一辆车。1942 年 10 月的一天，往湖北花园火车站送粮半路天黑啦，我们住在一个村庄，当晚新四军游击队张柯志队长找到我们住地，说服动员我们抗日打游击，我们八个人商量同意后，将一车军粮卖掉，跟随张柯志到枣阳以南山区打游击。后来，皮定钧司令员在豫西建立抗日根据地，我们部队编入其部下一个团的一营一小队，在禹县境内与日军多次交战。记得第一次是在禹县神垕镇北边一个小山上，当时日军约有一个连的兵力，我军一个营三个小队。日军在山上，我军在山下，开始由二小队正面出击与敌军拼刺刀，打半个小时伤亡较大撤退下山，紧接着俺一小队冲上去，每支枪压六发子弹全是顶堂火，日军是拼刺刀不开枪，我们是看见日本鬼子就开枪，日军伤亡很大，很快败退。第二次是在禹县西白沙与日军打了一个小时，敌军败退我军没有伤亡。

第三次是这年冬天，我们一营三个小队一齐开往禹县方山和日军作战，两军相距一里多远，我军先上山，日本人在山下，双方枪战有一晌时间，日军逃跑，我们乘胜追击。追有三里远，我二小队捉住两个俘虏，穿着日本军装。经审问一个是四川人，态度诚恳，认识错误后跟我们当兵，另一个是汉奸，只说日本话，不讲中国话，态度很不老实，他死不投降，指导员很生气，就拉出去枪毙了。这次战斗结束后，在白沙休整了一段时间，搞政治思

想教育，贯彻上级文件，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行军事训练，学修工事等。

第四次是1945年7月，我军一营与日军和土匪在无梁西石门接火，交战不久日军逃窜，只剩下土匪汉奸百余人顽抗。向东追到郭庄西门外，带队人手举白旗说是自己人，双方可以派代表谈判，结果是假投降，这伙土匪进西门就把寨门关闭了，寨墙上机枪、步枪齐开火，当时我持步枪冲在前边被敌人打伤了右腿，此时全营猛攻，打开了寨门，敌人向水磨河方向逃窜，我军追至无梁路口返回。

活捉敌师长

1947年2月，部队在洛阳西铁门打仗，我受伤掉队被国民党十五师抓住，在该师山炮连当兵五个月，挨打受气，常想啥时能回到革命队伍。同年7月，八路军渡黄河南下时，在洛阳西遇到了八路军一个排长，我说明情况后收下了我，指导员找我谈了过去的情况，将我编入二野四纵十旅二十八团一营一连，后来当了班长、排长并加入了党组织。

我在国军十五师山炮连那段时间，副师长杨天民常到我们连队察看训练情况，我对此人有所了解。1947年9月一天晚上，我军二十八团在汝州与国军十五师作战，敌军败逃郟县城被我军团团包围，兵临城下，四门关闭。我连编为突击连，我班编为突击班，我是副班长。开始，先由工兵炸开城东门，我和班长王喜才带全班八人冲到十字街口，听到南街不远有脚步声向北来。我先问话：“是谁？”答：“是我。”我听出话音是国军十五师副师长杨天民的声音，就佯说：“是杨副师长吧？”杨说：“啊！自己人。”这时班长王喜才立即开枪，打伤了杨的通讯员。我跑上前去抓住杨天民的前胸说：“你是谁的副师长？”此时杨虽身带手枪，但未来得及动手就被擒了。霎时间我们全连冲入城内大街，师长吴××被一排抓住，还有一个陈副师长被三排抓住，敌军师长副师长全被活捉。此时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满城都是枪声。我们团一直打到第二天中午，国民党十五师官兵全部被俘。我团带被俘官兵火速南进。撤后第二天早上国民党援军才赶到郟县城。

打郟县城战斗胜利后，我们部队开到舞阳县驻下。10月，团部总结战功时给我记大功一次。四纵十旅特发了嘉奖令。

双堆集决战

1948年8月郑州解放，我部追逃敌军至开封驻扎，这时我已被提升为排长。不久赴济南参加了淮海战役动员大会，会后连队作战前准备工作。10月底奉命南下安徽省宿县北双堆集镇与国民党黄维兵团作战。当时我在四纵十旅二十八团一营一连任第二排排长。战斗开始，我营是第二梯队，四营为主攻。我们是步兵，炮兵是从别的单位调来的。作战地点在双堆集的李苇子、杨苇子、董庄三个据点中。在这里经常是攻攻守守，守守攻攻，李苇子、董庄战斗还比较顺利。杨苇子村战斗最为激烈，时间也长，攻击难度大。四营先上去，因阻力大不懂得炮兵和步兵的配合要领，一个夜晚全营伤亡较大。第二天团部和炮兵结合后，重新布署，让我们一营上去，我连为第一梯队，紧密配合炮兵。炮兵往前打，步兵向前冲，一步一步地攻。我带二排从侧面上去，正在向前冲时，敌人机枪向我扫射，立即伏在死人身旁不动，等扫射过去急速前进。距敌人机枪阵地三十米左右时，我投了一颗手榴弹，轰的一声炸毁了敌方机枪。此时，全排五十二人随我冲上去，一营的人也随即上去，把敌人压在两个战沟内，打到最后只剩下八个敌人举手投降。整个战斗日落开始，晚上十点结束，全歼敌人约一个连以上的兵力。我们在宿县双堆集坚持了一月多，黄维兵团的一个师起义投诚。淮海战役胜利后，我部调河南漯河休整，总结战功时，上级给我记大功一次，十旅发了嘉奖令，喜报送到家里。

进军西南

漯河休整后，我部改编成四兵团十三军三十七师二零九团一营二连，我是二排排长。

1949年4月21日我部渡江南进。排长以上干部随部队在随营学校学习。过江后，经南京、上海、浙江、江西、广东，到广西跟上大部队，学校干部各回原单位。1950年元月1日，我军向云南省挺进，追歼国民党二十七军。在我军猛烈追击下，国民党军望风而逃，我军穷追狠打，进攻较为顺利，不到一个月时间，一直追击到西康省南部。我军返回云南镇守昆明。这时排长以上干部集中学习文化一年，尔后归队我调任三排排长。在随军学校时由于工作积极负责，党内工作抓得紧；吃苦耐劳，行军路上帮助体弱的同

志扛枪、背粮等，本人受到表彰。我排进军西南中，没有一人伤亡，巩固部队工作表现出色，一零九团给我排记“特功一次”。

抗美援朝

1951年4月，我调华北补充二团二营八连，提任连副指导员，当时没有指导员，我代理指导员。没有连长只有一个副连长，我们俩负责全连工作，下属三个排。组织上给我们的任务是接新兵送朝鲜，先后两次接送新兵赴朝参战。第一次1951年7月，我们五位同志（包括三个排长），在四川成都市接新兵170多人，送朝鲜新义洲东步兵团。第二次1952年2月，还是我们五人，到山西省大同市接新兵200余人，直送朝鲜东海岸，交给炮兵团。在杨德站等车，住了四十天，又返回祖国。我们团在大同市住有两个月，转太原南太谷县城驻扎下来。在这里部队组织战士学文化、学政治，早上出操，平时搞些娱乐活动等，度过了一年左右的和平环境生活。

1954年春，上级决定调我们团到北京转公安部队。我因身体不好，也不愿改行，要求转业。6月6日团部批准我的要求，我回到家乡长葛县民政局报到。当时县里给我安排工作，我自愿还乡务农至今。

（整理者高根离：长葛市坡胡镇人，退休干部，地方史志爱好者。）

日军战俘营脱险记

苏根成口述 王铁柱执笔

我名叫苏根成，现年七十五岁，是石固镇北寨北大街人。1942年到1943年年馐，家中没吃的，没有别的办法就只好跟着北寨向义街郑鸿彪去洛阳当兵，干的是原国民党十五军，军长伍廷麟，十五军野战医院院长郑芳洲（石固北寨向义街人），我干了八个月看护兵，后被日军俘虏又住了四个月的日军战俘营，情况是这样的：

1944年农历后四月，日本鬼子进犯洛阳，在龙门口争夺战中，十五军与日寇打了三天三夜，龙门得而又失，失而复得，打了二十个回合。中国军队以落后的武器装备，顽强的拼杀精神，大量杀伤敌人后，撤退到洛阳城内，当时退守洛阳城内的军队有原国民党十五军和原国民党五十五军总人数约四万八千人。日本鬼子首先从西门发起进攻，集中大炮火力猛轰，把西门摧毁，接着是坦克和炮车冲进西街，在巷战中横冲直撞，打得中国兵抬不起头，坦克冲到我身边，差点轧住脚。经过两天巷战，中国军人除一小部分冲出包围失散外，大部分人都战死疆场。剩下一千余人大多是伤残或医务后勤人员，在粮尽弹绝情况下，被日本鬼子俘虏。我因腿部受伤亦被俘虏。

洛阳西工，有个高墙大院像监狱一样的地方，墙上边是铁蒺藜和铁丝网，墙外是一丈五尺深一丈五尺宽的壕沟，大门和四角都有岗楼。日本鬼子就把战俘集中关押在这里。我在巷战中腿部受了伤，当时我还不知道，只觉得鞋内粘糊糊的，一看才知道是流了血挂了花，我也被关押在战俘营。鬼子把战俘囚禁以后，不给饭吃不给水喝，稍有一点反抗，就用刺刀捅死。没有吃的，我们把监狱院中的树叶、树皮、草根、被套棉絮都吃光了，把污水坑里的污水，连同蝌蚪，劲斗虫，水涨绵都喝光了，连泥汁也喝了。饿过十天往后，鬼子给我们每人每顿饭发十粒八粒玉米籽，以后每人发半截玉米棒让生吃。鬼子们看我们生吃玉米的样子，发出阵阵狂笑。最不能容忍的是：他们随意让俘虏罚跪，让帽沿朝后，侮辱中国人，整天“巴格牙鲁”骂个不停，有些战俘坚持不跪，就被鬼子用刺刀捅死，每天被鬼子捅死和折磨死的就有数十人，拉到坑内又不掩埋，死尸成堆成堆的，院中有一大口井，死尸都填满啦。气味难闻呛嗓子，苍蝇蚊虫多得很，又是大热天。战俘们对鬼子

的暴行恨得咬牙切齿，但是只有把仇恨埋在心里。

农历七月间，鬼子一天给我们发一个窝窝头，七月二十二日这天，每人发了鸡蛋大小的窝窝头三十个，说是一个月的口粮，每天只能吃一个。那天晚上，我串连了几个老乡准备逃跑，就一气吃了二十八个窝窝头。半夜里让同村人杨金城驮着我爬上了高墙，跳了出去，落地时有响声，惊动了鬼子岗哨，从岗楼里出来端着上了刺刀的枪瞅了瞅，因为我趴在草丛里，鬼子岗哨没发现，就又回到岗楼门口。又等了约两个小时，鬼子岗哨有点困倦，掏出纸烟在罩灯上吸，我就趁机逃出了虎口，顺着大门往外出去的唯一通道，摸黑走了不远，就掉到一旁的路沟里，我把军装脱下来扔掉，还不见杨金城几个人逃出来。月牙儿升高了，我就慌慌忙忙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从洛阳回石固，我走了五天，回到石固镇老家，俺娘看见我人不人，鬼不鬼，满身伤痕就放声大哭。我好说歹说才劝止了俺娘。我说：“我不是好好的吗？不是回来了吗？母子团圆了还哭个啥？”

回家后，天天夜里睡不着觉，想念洛阳战俘营的很多难友。禹县郭连乡夏庄的夏建全，串连几个人，挖洞想逃出去，被日本鬼子抓住用刺刀捅死了，石固老乡杨廷兆，也是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挑死的，这些例子很多。在战俘营中的石固老乡杨金城，后来也跑回了石固。代喜春、李元章等许多难友都被运到日本国当苦役，北街代喜春死在日本，东街李元章，鬼子投降后回到天津有了信，王阅、王文渊一直没信。

被俘后去日生还纪略

罗四合 口述/王世荣 整理

我叫罗四合，今年已七十四岁了，是长葛县大墙周乡罗庄村人。

解放前俺兄弟四个，家里很穷，逢出壮丁或派差都有我家的份，逼得没办法。18岁时，我被派当兵来到山西眉山县，驻兵邙山时部队遭日军袭击，队伍被打散，我跑回了老家。

回家后不久，日军侵占开封，中原大部分地区已成为沦陷区。日军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许多地方人们纷纷自动组织起来，打击日寇。我的本家罗金波也组织一部分人，自称抗日游击队。我参加了这支队伍。

1943年秋天，我们这支队伍开到鄢陵县城，与刘景儒的泛东挺进军合并，两支队伍加在一起有1000多人。司令是鄢陵黄令店人，姓王；副司令姓张。罗金波当上连长，我是副连长。岚川府人朱升恩、新郑县赵楼村人赵青恩、坡底赵村人赵应堂三人是排长。

刘景儒是富家出身的青年学生，在鄢陵县驻扎时，我们每天生活所需都靠他家供给。一天，罗金波对我说没枪不行，他和三个排长要回家搞些枪。让我暂代他的职务。罗金波他们走后不到三天，我们就开到黄水东（按：即决口后的新黄河河东）打日本去了。

到河东驻到淮阳西北大申寨。司令刘景儒不大懂军事。民国三十三年阳历元旦那天，见有一小股日军，我们想去夺枪。一接触，敌人大部队就把我们包围了。打了一阵不能取胜，司令部下令突围。我们聚到寨西门口，刚一开寨门，敌人就开炮打过来，接连几炮，打死有二三百人，一个副司令也阵亡了。日军围上来，我们全作了俘虏。

日军叫我们把枪扔下脱光衣服，赤身跑步到淮阳城。路上因跑不动或跑得慢的，又被刀砍、枪刺死了许多人。

到淮阳城，我们全被关在一所房子里。人挤得动不能动坐不能坐，更不用说躺下，大小便都是站着屙站着尿。饿了两天，才抬了些馍往屋里扔。翻译官说：“拾着的要分给没拾着的吃一点。”就这样，还向我们宣传说，是“人道主义”。

在淮阳押了八天，仍赤身被绑上汽车送到归德（即商丘），住在一座兵

营里。墙外边有电网，逃出营房也逃不出电网，日军叫我们去看过两次死在电网底下的人。

严冬腊月，叫我们赤身下坑壕砸冰、挖泥、捞枪。据说是韩复榘退时扔下的枪。

一天给吃一顿饭，全是高粱米。没有菜没有水也没有碗，吃时每人给夹半铁锹，用手捧着接，撒地下就拾起来连土带泥一齐吃，同喂猪是一样。

有两个人想逃跑，被汉奸报告了。日军就把我们集合起来，叫这两个人站中间，日军放开狼狗去咬，把肉撕得一块一块，肠肚都扒出来了，真惨！

在归德约半个月，抬来一堆旧衣服，有军装有便衣，还有女人布衫，叫我们穿上。后又被绑上汽车押到济南，再坐闷子火车到天津，下车就上船，坐在底舱里。船真大，有一万多人还能躺下睡觉。

船到海中遇大风，抛了锚，走了十八天才到日本福冈县。上岸又叫脱光衣服，洗完澡，每人给了一点粉红色药粉叫擦全身及小便。衣服统统蒸了蒸叫穿上，然后开往山上去挖煤。

山是火山，土呈赤红色，煤在海底底下，上下运煤都是用电梯。这个矿有一万多人，有美国人、英国人和印度人，编成大队、小队和班，分日夜两班下井挖煤。日本男人和女人监工，男的都是缺眼少腿，像是残废军人。他们和我们吃同样饭，同样干活，连矿长的老婆和女儿也在井下干活。

下井干活都不穿衣服，男的用一块兜裆布，女的用一条围裙。一天三顿饭，不干活不准吃，每顿四个馍或吃米饭，一点咸菜一壶开水。菜都是海里生的菜，如“鹿角”之类，从没吃过新蔬菜。面是四等面粉，米是发霉的米，里面的虫都长得很长，无论米或面还都是从中国运去的。若遇风大运不到，就得挨饿。

生了病，他们怕失去一个苦力，也有医院给看，他们的药真灵，一般病，吃一次药就会好。如果是装病，医生给一包硫苦，吃了很拉肚。

吃饭、干活、休息，都是听吹哨，不听指挥就往海里扔。干活少了要挨打，我仗着几个老乡团结得好，才勉强活了下来。

日本投降时我们不知道。但见他们个个垂头丧气，有的人在大街上自己把自己的肚子剖开，痛哭的也很多。

我们的队长开罢会，说是日本投降了，叫我们冲出去去夺枪。一万多人一下子推倒篱笆墙往外冲，队长们拿着刀在后边督促，谁不往前冲就砍死谁。日本兵用机关枪打死好几百人，也没阻挡住。我们把枪夺过来就杀日本人，不论老少，光杀男的不杀女的。杀完街上的，又到乡村和各学校杀。美

国人、印度人领着我们整整杀了四个月，把猪羊牛马鸡鸭，也都吃了个净光。他们虐待我们，叫他们也尝尝被压迫啥味。

有一天来了一个中国官讲话，叫我们不要再杀了，准备回中国。我们马上欢腾起来。当时日本平民也很苦，每天也是排队领饭吃，像咱这里吃大食堂时一样。许多日本女人很愿意来中国，都打扮成男人跟着我们。上船时，叫都脱光衣服，一个跟一个上船，她们没办法，又都回去了。

在船上，我们暗暗联合起来找汉奸，把帮日本人压迫我们的汉奸找出来就往海里扔，大约扔到海里有三四百人。

走了八天到天津上岸，住在一所学校里，按路程远近发路费叫回家。另外还有不少骨灰盒，带送一个骨灰盒多发一个人的路费。俺村罗克强带了一个禹县某村的骨灰盒，回来后送禹县。他村保长说，他父母已死，老婆改嫁，家里没人收了。罗克强将骨灰盒又带回来，埋在柳庄寺庙院里。

我们在天津住的那所学校，放有很多接收日本的武器。那天晚上八路军去弄枪，枪响起来，队长不叫我们出屋，八路军弄走了很多武器。

国民党军队要留下我，我不干。走到解放区，又被留下看了几天仓库。老想回家，要求好几次，给我了几十斤米票让我回家。从石家庄搭火车到新郑下车，走到家，家里人都以为我早已死了，想不到又会回来。被俘数年的苦力生活，真如一场大梦。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整理者王世荣：见《辛亥革命对长葛的影响》注。）

华工的遭遇

王银堂 口述/邢海江 孙长锋 整理

一、当壮丁

我家住长葛市增福庙乡河沿刘村。生于1924年，自幼家境很苦，除有一间破茅庵外，地无一垄。1927年父亲病故，丢下母亲和大哥、二哥我们一家四口人。为生活，大哥、二哥都给人家当长工，我16岁时给人家当短工。1943年年仅刚过，冬季特别寒冷，我在小河湾搬干柴，甲长带了几个人，把我五花大绑捆起来带走，没和家里人见面就送到禹县汴（开封）兰（兰考）师管区当了壮丁，在禹县住了不久，即到唐河、巩县等地，经过四个月的新兵训练，于1944年2月补充到国民党五十五军×师×旅第282团一营二连当兵。

二、参加洛阳战役

驻洛阳有两个军，即十四军和五十五军。这两个军驻洛阳已有数年，地理很熟，但士气较低，战斗力不强。

我们到洛阳后，驻扎在洛阳南关的闸口街，部队纪律很松弛，作风疲沓，军阀作风严重，大官压小官，小官压士兵，对新兵看管很严，唯恐新兵逃跑。兵营的围墙两米多高，非常阴森，入到院内休想逃出。

1944年2月，形势紧迫，师里分给我们连队的任务是挖战壕工事，对付日寇侵略。战壕交通沟离城半里远，我们团和驻洛的其它部队也参加挖战沟、战壕，还没完工，敌人的炮火已经逼近，不断向我们打来，当我们的工事临近收尾时，敌人的炮火已猛烈向洛阳发射。面对敌人强大火力攻势，我们并不畏惧，个个咬牙切齿，准备狠狠打击来犯之敌。鬼子的战术，开始是白天猛攻猛打，我们是依靠战壕有利地形猛烈还击，坚守不退，每次猛攻都被我们打退，敌人伤亡很大。后来敌人改变了战术，实行夜袭，利用夜间连续向我们的阵地展开猛烈地炮击。记得一天夜里，我和一位战士在战壕里向前走，被敌人发现了，遭到敌人炮弹的猛烈射击。那位战士就应声倒下，一动不动。我以为他是被什么东西绊倒在地了，就赶快俯下身子拉他，可是怎么拉他也拉不动了，我就把他身上挎的轻机枪取下来，向敌人打了一梭子走了，这次我差一点丧了性命。战斗持续了二十多天，我们的人虽有伤亡，

敌人损失更大，死伤惨重。整个战局终因我们弹尽粮绝，又无后援力量。就在1944年农历四月初三我生日那天，大批日寇汽车拉着大炮，开着坦克进入洛阳城。

三、被俘

洛阳城失守后，我们被俘。全连只剩下三十几个人。

日寇对被俘军人惨无人道。首先是对病残军人一律用刀捅死、砍死，对活着的人用绳子10人一串绑起来，集中到一起进行折磨。我们连的人绑起后集中到一棵大松树周围，面对松树跪下，绳子深深地勒到肉里，疼痛难忍，全师只剩下几百人，也集中到这个院内，谁知鬼子并不杀我们，只是一直把我们圈在院内，饿着跪了三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他们把那些体弱坚持不住的人，就挖心杀掉，乱动不服从者，也要杀掉。三天内，从这个院被拉出去杀掉的有十几个人。到了第三天头上，鬼子开始给我们松了绑，每个俘虏分得了一把玉米面粉，让生吞下去不让喝水，松绑前，饿死、渴死二十几个人。我的腿都跪烂了，浑身象散了架，本想着没有再生的希望。

过了几天，鬼子强迫我们去修飞机场。在敌人的马刀下，在机场干了三个月苦役。

四、押往日本

1944年8月，鬼子又开始实施新的阴谋诡计。起程时，野蛮成性的日寇又把我们绑起来串成串，跑步向济南转移。在去济南的路上，日夜兼程，谁要是掉队或稍有反抗，鬼子就用战刀往脖子上一拉，身首立刻分家。在济南新花园住了半个月，又转移到青岛，在青岛住了一个星期就开始上船押送日本。在济南和青岛两地暂住的20多天时间里，被俘人员残遭杀害的有30多人。

9月初的一个早上，海面上雾气很浓，我们这些人胳膊上都紧紧地绑着绳，分两行串成串儿，在岸边候船稍有不从，即被日军就地砍死、刺死。不一会儿，从远处海面上驶过来两艘火轮船，上面挂着白底布红圆点的小旗，我们看到这上面的旗，就知道是日本的轮船，船靠岸后，日军用刺刀逼着我们上船，上船后白天不行船，他们怕飞机轰炸，在船上，也没有给我们松绑，给我们每人铲了一捧玉米糝子，让我们生吃，我们吃的时候，他们还哈哈大笑。一直到天黑，船才出发，每天只让我们吃两顿饭，纯是玉米面，吃也不敢吃，睡也不敢睡。谁要是反抗不满意，就惨无人道地把谁刺死扔到海里，有的不服水土晕船，一突噜下去起不来，鬼子就把这些人扔到海里去，行船七天七夜，到达日本大坂，就有十来个人被日军残杀扔到海里去了。看到这情景，我们只有把仇恨埋在肚里。

五、在日本当苦工

到大坂后，他们把我们从船上赶下来，大家都已经被折磨得少气无力，黄皮刮瘦。下船后，就被大坂的工头接管了。在大坂码头，每个人发了两个木簍子，在大坂的船上卸煤，装煤，把煤挑到附近的工厂。我们的腰压得都直不起来，每天都受尽了日本人的折磨和凌辱。

我们住到附近工厂，睡得很拥挤，躺的是双人床，被子又臊又臭。什么样的虫子都有，许多人都染上了皮肤病，有的溃烂成疮。我们生了病，他们也给看，就是不给好药，看了以后就赶紧撵你上班。我们挑煤八小时制，只能去得早，不能回来得早，迟到耽误挑煤就会遭到工头们的毒打。我们每天能吃到三顿饭，一顿只发两个小馍，一碗稀粥，根本吃不饱。因此，装卸煤的苦工，经常有昏倒在工地的，有的受不了折磨，就偷跑出去，这些人被发现了，不是杀就是打，非常凄惨，对不很好干活的苦工，工头们就用皮鞭乱抽乱打，骂我们是“病夫”，真是国耻难忍。一次八个山东人受不了非人的凌辱和打骂，偷偷地逃出装卸队。他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一个月后被抓了回来，日本人把他们捆起来，用铁勺儿把他们的嘴一个个地撬开，灌尿灌尿，用筷子撑开他们的鼻孔，使劲地灌辣椒面，把那八个人灌得死去活来，在地上翻滚大哭挣扎，其情景惊心动魄，目不忍睹。

六、暴动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大坂上空，经常有飞机盘旋散发传单，还有不知道什么国家的飞机，低空俯冲，炸毁日本许多工厂和商店。监工们对在中国战败的消息，始终封锁得很严密，但是他们不象以前那样对我们凶狠了。从那时候起。我们开始组织罢工，先是一个组一个组地秘密串连，最后发展到整个装卸队大暴动。我们对船上和工厂的警察，监工开始反抗，夺下警察手中的武器，杀死日本军队驻工矿船队的头目，大杀大砍，杀个痛快。

1946年8月，美国军队进驻大坂，对日本进行了袭击，看到这一切，我们的心高兴得几乎跳出来。

10月初，一位中国国民党少将代表，来到了日本大坂，告诉我们日本鬼子在中国已经无条件投降。不久，我们都坐上轮船回到了祖国，结束了三年多的苦工日子。

七、回归祖国

1946年10月初，我们在中国代表的带领下，启航返回祖国。我们坐日本轮船，比上次往日本时条件好多了，能吃上热饭热菜。回来时在天津唐沽下船，他们又把投降的日本军人运走。我们去的时候有二千多人，回来时，

只剩下几百人了。我们抱头痛哭，祖国啊，我们不能没有您。

在唐沽，我们下了船，因在日本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一个个骨瘦如柴，下船都走不动了。我们强坚持去天津，住了一天多，一位国民党军官对我们说：“你们这部分人编入九十四军，由九十四军接管，纳入该部的正规建制。我们都想不通，很想到家里看看。大家都背着行李出来了，住到一偏僻的旅馆里，旅馆又脏又破。几经折腾，我们也没有钱，就把多余的东西卖掉，住旅馆买饭，维持生计。我打听了很多地方，买票回家，但是路都不通，只得在外游荡。

不久，我便参加了国民党新成立的汽车五团，这个团没有干头，我就又参加了汽车二十三团，当了一名司机助手。汽车团的主要任务是给部队运送给养。后来，我随汽车二十三团调到北平，搞运输给养。有一次，上级命令我们去康庄运输给养。天快黑了汽车开到康庄，被驻在康庄的解放军俘虏，有的汽车司机丢下汽车就跑，都被阻击回来了。解放军讲了许多宽大俘虏，不打骂俘虏的政策，感化了他们，我们都将汽车开到解放军驻的地方，从此，便参加了解放军。北平解放后，我被分配到汽车兵团。在部队里我积极肯干，任劳任怨，受到过部队领导的表扬，在部队里干了二年，把铁路修好了，我请假回家，分得了土地，结了婚，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一九九二年四月

（整理者这一的邢海江：见《匪霸汉奸陈秀峰》注。）

和尚桥突围

陈正风

1944年4月23日上午。由于不断遭到敌机的空袭，部队行进的速度十分缓慢，直至下午3时许才到达长葛县和尚桥村。此处位于长葛县城以西，许昌以北。一条约500米长的南北土路是村内的主要道路，紧靠村东侧的平汉铁路此时已拆除，东面是大片的麦田。清颍河自北向南，在村西1500米处转向东南穿村而过，一座长约数十米的石桥连接着河两岸的大街。村南端地势骤然升高，两条深达2米的大沟与南街口相交。一条伸向东南，另一条伸向西南，分别是通往许昌和禹县的大道。两条沟之间是一块三角形的坟地，其顶端正对南街口处有一座五道庙。坟地居高临下。地形十分有利。这里虽是许昌以北的重要屏障，但在我们到达之前，既无部队防守，也未构筑防御工事，仅在村边挖了一些立式或跪式的散兵坑。新二十九师第八十六团（欠第三营）驻守在和尚桥以东的几个村里，团部驻和尚桥东南约1500米处的一个村庄。

经过20多个小时的连续作战和行军，官兵们是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和尚桥保公所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饭食，刘昌义决定在此宿营，翌日再去许昌。

饭后，刘军长用保公所的电话与驻许昌的吕公良师长通了话。这时，上校参议王宝斋（河南镇平人）和王海东（河南修武人，前第八十一团团长）便装自后方来见军长，要求去敌后组织抗日部队。经军长批准，我发给他俩每人10张盖过暂十五军关防的空白差假证和公函纸。后来听说，王海东在组织抗日队伍时被日军逮捕杀害。

下午4时，哨兵跑来报告，说在和尚桥北面2公里一个村庄里有大队日军，正向和尚桥开进。刘军长命令第七十九团立即进入村边阵地，准备战斗。由于没有防御工事，部队只得利用房屋和墙壁坚守。

面对蜂拥而来的日军，我军则因炮弹用尽而无法进行远距离拦阻射击，只能待其迫近时以轻武器进行近距离作战。日军的行进速度很快，下午5时30分即与我军接上了火。我七十九团官兵沉着应战，以手榴弹打退了日军的第一次冲锋。然而该团以不足600人对付数千日军，无论在人数上

还是在武器上均处劣势。当日军第二次冲锋时，该团已无力支持，只得退入村内防守。

战斗打响后，我一直在密切注视着日军的动向。此时，我发现日军的后续部队正向我左翼运动，有经村西向南迂回，夺取村南高地，对我军进行前后夹击之企图。我急忙将此情况报告给军长。刘军长命令第七十九团继续阻击正面之敌，自己带领胡光耀营、特务连和军官队立即离开保公所，数名警察和保公所人员紧随其后，顺着街道向南跑去，在通过石桥时，几乎是与我们齐头并进的日军已自村西的河道用机枪向桥面射击，我军有几名士兵倒下。刘军长一面组织火力掩护，一面指挥部队低姿跑步前进，迅速通过石桥直奔村南口，终于抢先一步占领了村南的三角形高地，我军居高临下，与从村西绕过来的日军展开了战斗，将日军压迫在沟道内。

晚7时后，日军接二连三地对高地发起冲锋，战斗更加激烈，五道庙的庙顶已被日军的机枪掀掉，高地上的几棵小树也被打得光秃秃的。我军官兵英勇顽强，用手榴弹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日军的进攻。守卫和尚桥村的第七十九团与日军逐房逐院地争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和尚桥以东的几个村庄周围，枪声、喊杀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此起彼伏，守卫在那里的第八十六团（欠三营）也正在与日军作战。

这时，我们发现和尚桥村东的大片麦田里无我军部队的防守。为了防止日军由此钻隙南进，刘军长命令我迅速通知姚俊明团长，派一个连去填补空隙。我怕时间来不及，就建议先派军官队越过沟道向北警戒，军长同意。于是我便带领仅剩20人的军官队，由高地东侧越过沟道，到达指定地点，然后独自一人提着手枪沿沟堤直奔东南。

在距和尚桥1500米处，我找到了姚团长，向他传达了军长的命令。姚团长听后十分为难，他领我到团部，说：“你看，这里只剩下一个排的预备队了，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能拉上去应急。”我们来到阵地上，战斗很激烈。当夜刮起东北风，黄沙扑面，我军阵地面向北方，对作战极为不利。我跟姚团长在阵地上巡视了一遍，深感兵力已不敷使用，若强行抽出一个连，势必导致全线溃退，因而只得急速回去复命。

当我跑到距坟地200多米处时，发现一人迎面而来，我立即隐蔽在麦田里，高喊：“口令！”对方说：“是我呀！”我一听是刘军长，连忙站起身来问：“你一个人到哪儿去，怎么连卫士都不带呀？”军长说：“卫士班都去拼刺刀了，我还带什么？你去了半天还不回来，我是来找你的。”我说：“小声点，路北的情况不明。”话还没说完，日军就从路北约50米处的麦田里

用机枪扫射过来。紧接着又是一阵步枪声。我抓住军长的袖子往下一拽，弯腰低姿跑回坟地，钻进一个已经迁葬的墓穴里。此时，坟地西侧三营阵地前的日军不断发起冲锋，东侧特务连阵地对面日军的火力也十分猛烈，我军已是腹背受敌。刘军长突然从墓穴里一跃而起，骂道：“他妈的，和鬼子拼了！”他脱下大衣扔到一边，又摘掉军帽甩出老远，端着枪要冲上去和日军拼命。我急忙把他按倒，说：“军座，现在可不是拼命的时候。你还要去许昌指挥新二十九师作战呢！”

这时，日军已占领了和尚桥的北半部，我七十九团经过激烈巷战，被迫撤至清潁河南岸，与村南高地上的三营和特务连阵地相衔接，利用南街两侧的房屋继续阻敌。24日凌晨1时许，守卫在和尚桥以东麦田里的军官队人员已全部阵亡，八十六团阵地上已是一片沉寂。半小时后，和尚桥东南八十六团团部方向经过一阵激战，枪声也逐渐稀疏了。不久，日军的机枪由那里向我阵地后方打来，我军已处在日军的东、西、北和东南四面包围之中。我军以七、八百人的疲惫之师，孤军困守和尚桥一隅，既无力消灭或击退数倍于己之敌，更不可能长期坚守，若待天亮后日军发起进攻，就会招致全军覆没。于是，刘军长决定1时50分突围。他让我派传令兵去通知刘耀军团长，又从三营和特务连挑选了20名精壮士兵组成奋勇队担任掩护。

凌晨1时50分，潜伏在原八十六团团部驻地村边的奋勇队向村内的日军掷手榴弹，顿时枪声大作。我阵地东面的日军调转枪口向东南盲目射击，西、北两面的日军也都在注视着那里的突变，我军乘机迅速撤离了阵地。日军虽已发觉，但因天黑看不清我军的动向而不敢冒然追击，只是在原地胡乱打枪。我军以北极星为准，先向南再向西南，冲出了日军的包围圈，然后又转向东南，朝许昌方向转进。

一九八六年六月

（作者陈正风：时任国民党暂编第十五军参谋处作战参谋兼军长侍从参谋。）

东魏庄战斗

石立志

经过一年的自卫战，1947年5月，解放战争已经由自卫发展到反攻阶段。我豫皖苏军区各个部队，为了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的有力反攻，经常主动出击，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省专县保安团队及地主还乡团之类的反革命武装。敌人一批批的不断被我们消灭。城市一个一个地被解放，各地人民政权不断建立起来，豫东地区的一些县城多半是这个时期解放的，有些县城先后解放过多次。开始，我军以消灭敌人的反动军事力量为主要目的，一打下县城，把敌人消灭之后，就立即转移了，留下一个空城包袱，继续让敌人背上。有些县城解放多次我们才去真正的控制它。那时候，我豫皖苏军区主力部队经常驻在多年的小解放区“睢杞太”，然后西华、扶沟等县大部地区解放了，我们也在这一带活动休整。

夜袭洧川县城

5月8日，我豫皖苏军区特务团团部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部署我团和豫皖苏军区独立旅三十四团联合夜袭洧川县城。洧川县位于河南中部，是豫东解放区外沿的一个待解放的小县，全县有自卫队等县乡反革命武装约数百人，都是些没有多大战斗力的土顽。这次由我们特务团担任主攻，三十四团配合作战，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政委吴芝圃，副司令员魏风楼，政治部主任王幼平，参谋长陈明仁等同志亲自指挥。团首长强调部队夜行军时沿途如遇小股敌人，就猛打猛追，不和敌人纠缠，不给敌人喘息时间。那时我在特务团一营二连担任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这次行军一营为前锋，负责主攻。营长、老红军张友发同志分配了一营三个连的战斗任务。晚上八点左右，部队从扶沟出发，快到半夜时部队前进到距洧川县城大约有五里路处（现在看来可能是丁庄、纸坊一些村庄，或是养马寨一带村庄），和守城敌人派出的小股游动哨遭遇。战斗打响之后，敌人一边向洧川县城方向跑，一边向后胡乱放枪，以达到向城内敌人报警的目的。我连是先头部队，紧追不舍，兵临城下，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三个排分三路由城内猛冲。城内敌人

听到游动哨的枪声，就弃城逃跑了。我们连冲进国民党洧川县政府，各个屋里虽然仍点着灯，但空无一人。群众告诉我们说，他们一听见城外枪声，就不要命地向城西北逃跑了。敌人伙房里煮了一锅猪肉，还有三条三、四斤重的鱼。我们真有幸啊，敌人的这些“慰劳品”，我们就不客气的收下了，让炊事班的同志带上，给部队改善生活用。

这次夜袭洧川县城虽然扑了空，但紧接着在东魏庄和谢坊全歼了南阳两个保安团，在精神上给敌人一次致命地打击。洧川县的敌人吓破了胆，总担心那一天会被我们围歼的。东魏庄战斗，给部队后来在洧川的多次战斗以很大的精神鼓舞。

东魏庄战斗经过

我们歼灭洧川县城内敌人的夜袭扑空了，怎么办？司令员命令说，敌人跑了，部队转回去继续休整。当部队行进到东魏庄时，突然出现一个敌人哨兵大声发问：“那一部分的？”我们的团长岳华同志骑马随一营行军，听到有人发问，误认为是兄弟部队三十四团的先头部队，这个江西老表是南方口音，随口回答：“我们是魏庄部队。”就听那边骂了一句：“妈的，什么魏庄部队！我们就住在魏庄。”随话音打出罪恶的一枪。随即看见岳华团长从马上栽下来。他就是邓小平同志在广西百色起义时任红军连长的岳华同志，多年来身经百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万万没有想到会在东魏庄这么个小地方，与国民党保安团残兵败将杂牌土匪遭遇而光荣牺牲。岳华同志为什么答我们是魏庄部队呢？因为那时部队的番号，为了对外保密都有代号，如三十四团的代号是张娄部队，我们特务团的代号是魏庄部队，团的领导也叫号，如团长叫01，政委叫02等等。当时岳华团长还不到三十岁，他原是刘邓大军七纵的老团长，张国华司令员原是刘邓大军七纵政委，和岳华同志一起战斗多年。岳华同志壮烈牺牲后，张国华司令员、吴芝圃政委很快赶来，命令几位团首长迅速坚决全歼东魏庄这股敌人。岳华同志光荣牺牲对全团指战员震动很大。因为，一个月前的李寨战斗中，政委裴山荣同志光荣牺牲了，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我们特务团先后牺牲了两个主要领导干部，而且都是老红军。新仇旧恨，激励着全体指战员，全团士气大振，战斗气氛更高。

侦察员了解到驻在东魏庄的敌人是南阳保安团的一部分，装备一般，人数不足千人，多是抓丁拉夫组建而成，没有什么战斗力。郭副团长和副政委

王留三侦察了地形。东魏庄位于鄢洧大道旁，为防土匪筑有土围子，有东西寨门，寨高约两丈，寨顶宽五尺左右，修有许多小寨垛，寨的四角各有一个小炮楼，寨外有近两丈宽的护寨河，终年有水，是个易守难攻的小村寨。

我们这个团多年打攻坚战，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加上大家要与团长、政委报仇，斗志高昂，求战心切，就迅速地把东魏庄包围起来。团领导选定东魏庄西门为突破口，采取强攻的办法。我团有三挺重机枪，两门迫击炮，三个云梯，组织包括我连六挺轻机枪在内的强大火力网压住敌人。一营主攻，二营随一营进寨，三营准备打援。我连一排担任突击队，二排一个班负责架云梯，一个班准备爆破，在必要时炸开西寨门，其余的人随一排突击。郭副团长下达了攻寨命令，轻、重机枪、迫击炮一齐射向敌人，尔后冲锋号吹响，冲杀声响彻云霄，手榴弹在寨墙上不停地爆炸，我们二连勇猛顺利地冲到寨墙上，迅速向左右扩展，敌人被打得四散乱跑，三连也跟上来了。正在这时，突然有三发迫击炮弹恰好落到我军正在冲击的部队中爆炸。这突如其来的爆炸，使我连伤亡三四十人。郭副团长对此异常气愤。炮弹爆炸之前，通讯员告诉我在东魏庄寨墙上地堡内有三具敌人尸体和一挺机枪。我随通讯员下地堡里拿那挺机枪，三颗炸弹正好爆炸，不然我也会和那些伤亡的同志一样牺牲在寨墙上。我这是第二次幸免了。

三发炮弹爆炸后，我军向两翼的冲杀顿时停了下来，跑得四散的敌人，在敌军官的威胁强迫下，发起了垂死的反扑。又经过一阵激烈紧张的战斗，我一营三个连全部突入东魏庄寨内，双方在街道和院内反复冲杀，击毙了一些敌军官和士兵。团政委王留三、团政治处主任马杰，一直和我们一起战斗，赤臂上阵。打得敌人溃不成军，有的跑到群众院内，有的跑到群众屋内，有的敌人藏在群众红薯窖内，有的躲在群众屋内的棚子上，有的换上了便衣。在激烈的枪战之后，我们的战地政治工作开始了，大声向敌人喊话，放下武器，缴枪不杀，顽固抗抵，死路一条；并大讲我军的优待俘虏政策，大部分敌人举手投降了，有敢于继续顽抗者被当场打死了。有一个敌连长带领四十多个敌兵企图逃跑，碰上我们二营五连指导员。这个指导员当时身边只有通讯员和司号员，他们大声喝道：“还不赶快缴枪投降，你们已被包围了。”就这样，他们也顺顺当当地交了枪，当了俘虏。最后敌人只从东北角跑出去几十个人，其余全被俘虏了。紧张的战斗一直到午后才全部胜利结束。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俘敌六百多人，缴获敌机枪数十挺，步枪六百余支，子弹数千发。

战斗结束时，传来了三十四团在谢坊也全歼南阳另一个保安团的胜利消息。事后，三十四团团长、老红军抉庭修告诉我，他们在谢坊的战斗也很顺利。郭副团长告诉我，在东魏庄战斗中打那三发炮弹的是一个刚被俘虏不久的国民党炮兵，是特务分子。审问时，他直言不讳，还呼国民党万岁，当时命令战士把他拉出去毙了。

在这次战斗中，还牺牲了我的一位老战友、老乡一一三连指导员王连安同志。他是我县六区陶娄村人，过去我们在一个班当兵，我升任班长，他当副班长，我们俩关系甚好。

战斗结束，抓紧处理善后工作。团党委决定岳华团长、王连安指导员等五六个领导同志的尸体，转移到较稳定的扶沟、鄢陵解放区掩埋，其余同志的尸体就在东魏庄附近选块好的地方掩埋，烈士的坟前都树一木牌，牌上写明牺牲烈士姓名、职务和籍贯，以便今后家属和人民群众纪念。这些善后工作安排好之后，大部队就迅速转移了。

战斗之后，对俘虏进行了教育、审查和安置，有要求留下当解放军的，有要求回家的发了足够的路费。

一九九〇年十月十一日

（作者石立志：曾任长葛县县委副书记）

官亭围歼战

李华民/樊水来 整理

[此材料是根据官亭村尹坤峰、樊水来、刘亚民，何庄张金声（曾任国民党骑兵第一旅第二团副连长）、张培强等人座谈回忆当年亲见、亲闻情况和参考有关资料整理的。因未找到解放军参战部队，史料难免遗误。敬请知情者斧正。]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农历十一月初一日）下午五时许，国民党骑兵第一旅第二团残部约一千三、四百人，从官亭乡湾李、相庄由东向西渡过双洎河，企图到官亭寨内暂驻。

官亭村樊水来当时七岁，正在北寨墙上玩，看见骑兵从东门进寨，吓得赶紧跑回家里。李华民在新郑县上中学，因打仗学校放假，回长葛老家途经官亭寨内，见骑兵正在卸鞍宿营。

国民党骑兵第一旅，原为胡宗南部骑第七师，师长是少将张绍成。该师一九四六年于甘肃省庄浪县改编为骑兵第一旅，又接收了日本投降时缴获的精良武器，全部换成蒙古马，轻重武器齐全，人员充实，被胡宗南吹嘘为战无不胜的“铁军”。该旅下属三个团，旅部设机枪、炮兵、通信三个连，直属政治、军需、军医、军械、兽医五个处。团辖骑兵四个连，另有机枪连，炮兵连和一个通信排，团部设正副团长、团副和五个与旅部对口的室。每个连二百人上下，全团约一千四百人。

一九四七年六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突破黄河天险，从鲁西南千里跃进中原。蒋介石慌了手脚，赶紧调集兵力，企图围追堵截刘、邓大军。国民党骑兵第一旅奉命，由甘陕迅速东进，经洛阳，走禹县，到叶县，旋奔许昌。这支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吹嘘的“铁军”进入中原后，由于快速机动，武器精良，横冲直闯，对解放中原的进程干扰很大。因此，消灭骑一旅，已成为我军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年冬季，刘邓、陈谢、陈粟三支大军威震江淮河汉之间，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涤荡着敢于抵抗的国民党残兵败将。骑一旅二团在我军的强大压力下，疲于奔命，从许昌窜到洧川，又惶惶逃到官亭寨内，企图北向郑州靠拢，或南下重返许昌。

官亭寨是长葛、新郑两县交界处的一个小集镇，北距新郑县城、南距长

葛县城均为二十五里，东距双洎河三里，西离京广铁路只有200米。寨内居住着160多户农民，共有八、九百口人。官亭寨有四门，寨内有四道街，南北大街有五家饭店，日用杂货店四家，卖经济小吃的摊贩十多家，东西街有两家商行，三家屠户，十字街中心有天主教堂、大染房；新郑县城通往长葛县城的大道正穿过南北大街，寨内逢单日集会，周围十里八村的人都去赶集购买日用杂货，平时过往行人很多，小集镇显得非常热闹。官亭寨地处长葛北大门，地形十分复杂。寨子周围有纵横交错的荒沟十四条，寨墙有两丈多高。

骑一旅二团进驻官亭后，在守和逃的战略上团长叶烈公与副团长的意见大相径庭。团长认为官亭寨沟壑太多，不利于骑兵进退，是孤立的死地；副团长则强调寨墙高大，临铁路线，又是公路交通要冲，固守待援万无一失。最后团长赌气带亲信十余骑出走。副团长当即命令砍伐树木，设置路障，装置沙袋，堵住了三个寨门，仅留西门作为退路，在寨墙周围挖战壕，筑碉堡，把家家户户的大门、房门都搬去修工事。他们还翻箱倒柜，抓鸡杀猪，把老百姓搞得鸡犬不安，年轻的妇女故意把脸上抹上锅底灰，藏在红薯窖内，青年男子跑到外村躲藏，青年学生董根发藏在他家地窖里两天没有敢出来。

解放军某部奉命追歼骑一旅二团，当敌人进驻官亭寨后，解放军徒步直追马蹄子，天黑时即从后白和新郑境内的黄湾过河，神速地包围了官亭寨。晚上十一点左右，解放军在寨外坟地外沿的沟壑里开始佯攻，侦察火力。敌一千三、四百骑群集在一个不足两平方华里的寨内，听到枪声，顿时乱作一团。解放军乘机利用有利地形和黑夜的有利条件，迂回到寨墙外边构筑了工事，做好了战斗准备。

夜半时分，从正北方向飞来了一架飞机，在寨子上空盘旋了一会就飞走了。后来又听说一件事，骑兵团副团长向郑州骑兵留守处呼救求援。留守处立即派汽车把弹药送到新郑南关，又抓了七八辆拉卖煤的牲口车运往官亭。当弹药运到离官亭寨只有七、八里地的杨树岗村时，被解放军外围部队截获，连夜又分发到指战员手里，给我军充实了弹药。

十三日拂晓，随着官亭寨西北角升起的红色信号弹总攻开始。霎时，军号声、枪炮声、冲杀声、震天动地。敌人在内无弹药，外无救兵的情况下，企图集中兵力从西门突围。敌人冲向西门口时，我军轻重火力齐发，敌死伤惨重，又折回寨内。八时许，敌人组织第二次突围，强抓了张庆祥老汉和长工银河等六个农民，将他们推上大洋马开路，从西门冲出去。因农民不会骑

马，冲出去后未跑到铁路边就先后跌下马来。敌人乘此尾随蜂涌而出，我军放过农民之后，又拦腰截杀，大批人马被歼灭在西寨门内外。事后群众说，解放军打枪很巧，不打农民，光打骑兵。我东线围攻部队飞速逼近东门，固守在奶奶堂的敌人未及后撤，就全被我军缴械活捉。从南寨门仓皇出逃的敌人顺着古路沟南窜，埋伏在铁佛寺北人字沟口的解放军用轻重机枪和步枪迎头痛击，一时人仰马翻，尸横沟壕，少数窜入东南沟又企图夺路逃跑的，又被步兵截住，展开了肉搏战。解放军从四面冲进寨内，一时间，枪炮声，和“抓活的，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等喊声响成一片，吓得敌人乱成一团，大部分举手缴械投降，敢于顽抗者，被当场击毙。最后，有少数顽固分子龟缩到寨中心宋俊卿家的楼上，解放军把三间楼房团团包围，在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下，他们只得把枪枝弹药从楼门里扔下来，下楼举手投降。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将近午时。

这次战斗，解放军抓的俘虏、战马成群，死尸、死马成片，到处血迹斑斑，被枪弹打断的树枝到处皆是，特别是西寨门里外，行人要想通过此路，必须从尸体上踏着走，寨南古路沟里死马成堆，麦田里受伤的马匹或立或卧，一直到战后第三天，老百姓才把死尸埋完。据亲见者回忆，这次战斗毙敌 500 多人，俘敌 400 多人，溃散逃亡者 200 多人，重伤 40 多人。

对 40 多个受重伤的敌人，解放军按照人道主义情神，将其分别抬到关爷庙和奶奶堂，每人发给两块大洋，进行安置治疗。农民张太和给他们送饭时，一个伤兵说：“解放军发给我两块现洋，让我治伤。我的伤治不好了，也回不去甘肃老家了，这两块现洋给您，您给我弄点吃的算了。”

解放军指战员，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20 多人，这些忠骨英灵仍长眠在南寨门外古路沟三角地带的崖头下边。

（整理者李华民：长葛市粮食局干部；樊水来：官厅乡政府干部）

回忆石固的第一次解放

王铁柱

1947年12月20日下午，解放军兵临石固镇，驻扎在石固的国民党自卫队早已闻风而逃，在石固镇开粮行（粮行靠近城门）的李福恩，用一柄大斧砍掉城门大锁，解放军不费吹灰之力进了城。

解放军大约是三、四十人，军容整齐进入石固。入城后，李福恩领着解放军到镇公所一看，各屋空无一人，伪政人员已逃之夭夭。解放军问明李福恩的姓名身份后，向他表示了感谢。随即在太尉庙门外墙贴了一张布告，内容大意是：查石固镇牛、杨等人剥削群众，鱼肉乡里，特将其一部分家产粮食物品分配给广大贫苦群众，望其他商民切勿惊扰……落款是解放军豫皖苏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部。当天晚上，对上述几家大地主进行急性土改，千余贫苦群众分得了粮食衣物。解放军政工人员还在东泰骡马大店院等好几个地方搞宣传，内容大意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劳苦大众翻身解放是群众拥护的正义事业，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不断取得胜利！而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是坑害百姓祸国殃民的，搜刮民脂民膏不得民心的，所以必然要失败。他们的宣传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博得听众阵阵掌声。在急性土改中，解放军也筹集五太平车粮食和一部分军鞋，当天夜里撤离了石固。

（本文作者：王铁柱，生于1932年5月，石固镇人。1949年7月参加工作，1993年离休，现任《长葛文史资料》特邀编辑）

攻克和尚桥敌军据点的战斗

刘登云

[《文史资料》原编者按：1947年11月下旬，号称小诸葛的国民党国防部长、九江指挥所主任白崇禧，调集33个旅的兵力，围攻我开辟大别山根据地的刘邓大军。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反围攻斗争，华东野战军一、三、四、八纵队，与中原野战军四、九纵队于12月11日发起平汉铁路破击战，华东野战军三纵（司令员何以祥），担任破击官亭至许昌段铁路的任务。三纵九师二十七团二营六连受命攻取和尚桥火车站。本文作者为当时六连指导员。]

1947年9月，华东野战军在陈毅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的指挥下，跨越陇海路挺进到豫皖苏地区，实行外线作战，不断取得胜利。为了配合刘邓大军的作战行动，上级决定进行平汉铁路破击战。要保证破击任务的顺利进行，必须首先拔除敌人设在铁路沿线的据点，消灭守卫铁路的敌人。

1947年12月中旬的一天，我（当时任连指导员）和连长程苍业同志去团里接受任务，团首长把攻克和尚桥敌军据点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六连。首长把敌情和战斗任务作了大致交待：和尚桥是平汉铁路上的一个小站，车站东北约15里是长葛县城（今老城——编者），敌军在和尚桥据点驻有交警总队的一个中队约80余人，武器全部是美式装备，配有白郎宁轻机枪三挺，其余是美造卡宾枪，手提式冲锋枪，军官配带的是加拿大手枪，敌军战斗力较强，不能轻敌。团首长还要求我们对敌军据点的工事建筑、兵力部署、周围地形作进一步侦察了解，摸清敌情。团首长还传达了师政委刘伟同志的指示，要我们很好地向部队作动员工作，作好充分准备，坚决拔除敌军据点。最后团首长深沉地对我们说：这次战斗没有重武器配合，全靠充分发挥现有武器的威力。

我们接受任务后，对敌军据点作了详细的侦察。和尚桥据点位于铁路东侧，距路基约一百米，座西朝东，据点西边二百米有个村庄，有一小路通往据点。整个据点就象一座城堡高耸在地平线上。中央是一个河堤式大土堡，顶端用沙袋垒成圆形工事，设有机枪掩体，可向任何方向射击，土堡高约10米，里面是中队指挥所，设有吊桥联结内外，据点四角各筑有一个小土

堡，是敌分队值班人员的休息之处，也是直接防御点。中间筑有壕沟掩体工事，堡与堡、堡与沟和工事都是贯通的，便于调动兵力火力支援。据点周围挖有壕沟，直贴河堤式土围，宽约2米，高约3米。大大堡和各小土堡昼夜都设有哨兵警戒。据点南北两面是一片开阔平地，便于敌人火力控制。

根据敌人的兵力布置、工事构筑和设防情况，以及周围地形，我们迅速拟订了战斗计划：第一排约50余人由连长程苍业带领，配以轻机枪两挺，从据点东南方向进攻；第二排40余人由我带领，携带两挺轻机枪，从东北方向进攻；第三排为预备队，隐蔽于机动位置，准备在第一、二排攻破敌据点时迅速冲进去歼灭据点内的敌人。我们还规定了联络信号和识别标志，对攻击的武器、工具、跳板、梯子都作了充分准备。战斗外围的警戒请求上级作出安排。

经过紧张的战前准备，各项工作就绪。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连进入了战斗阵地。午夜，进攻开始。担任主攻任务的一排悄悄地来到壕沟边，迅速将两块跳板（长4米、宽1米）搭上壕围。就在此时，敌哨兵闻声发觉我军突袭，慌忙开枪报警，同时大叫：“解放军来啦！”一排战士通过跳板搭梯子迅速爬上了土堤，趁敌人熟睡中惊醒正在混乱之际猛掷手榴弹，炸得敌人血肉横飞，乱跳乱叫。这时，大土堡中的机枪开始向我猛烈射击，我们则集中火力还击，压制敌人火力。第三排随即攻进了据点，向据点两侧的敌人射击，第一排继续进攻大土堡，这时敌人已无法组织反击，只有各工事掩体内的敌人在还击。

从东北方向进攻的二排，在听到一排的战斗打响时，也搭上跳板和梯子冲进据点。由于敌人摸不清我方的整个情况，注意力集中在一排方向，二排乘虚而入，一面和一、三排联络，一面组织向敌人大土堡进攻。当敌人发现我另一支部队冲进来时，惊慌失措，首尾不能相顾。二排连续向敌人土堡中的机枪投扔手榴弹，把敌人土堡上的机枪炸哑了。我们一面冲杀，一面喊话，开展政治攻势，敌军中队指挥部的军官，听到整个据点内一片喊杀声，已知大势已去，抵抗无济于事了，举手向我们投降。三排迅速搜剿残敌，肃清了各掩体和大小工事中的敌人。

战斗从午夜一时左右开始，三时结束，我们牺牲了两位战友，却毙伤、俘虏敌军60余人，只有少数敌人趁黑夜逃窜。缴获敌人轻机枪三挺，卡宾枪、手提式枪等各种枪支40余支。这次拔除和尚桥敌军据点的胜利，为下步铁路大破袭开辟了道路。全连指战员英勇杀敌的事迹，受到师部的嘉奖。

一支活跃的武工队

1948年2月，住扶沟县汴岗的中共豫皖苏区党委从山东渤海抽调一批干部，决定由王加奇、郭道远、周锡禄、砦轩、阎泽民、李大英、崔善才、任万功、李金华等九人组成武装工作队，王加奇任队长，到南席以西、董村以东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建立民主政权，组织群众搞土改，闹翻身。

2月中旬，武工队到达南席，与原在南席工作的徐水波、李九皋接头。观察了各村的地形，选择马台村（现属南席镇）作为主点，白庄村（现属古桥乡）作为前哨副点。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培养积极分子，建立农民协会，收缴各村寨的枪支武器，组织保田队。白庄附近村庄的郭培明、周培人、秦福海，马台村的李友仁、李海龙、周修在、郑于森等都是这时参加工作的积极分子，遇有重大行动，和徐永波、王继光领导的南席保田队一起，组成百余支枪支的武装力量。

敌人并不甘心失败，1948年5月，由洧川、新郑、鄢陵等县国民党自卫队残部拼凑起来的长葛县自卫机动总队第四大队，从庙张、贾集、魏庄村进攻马台，王加奇率领保田队进行顽强抗击，由于寡不敌众，东撤南席，敌人进入马台村，挨户搜查，抢劫财物，抓走群众10人，并残暴地将积极分子唐森、赵学中杀害。武工队返回马台后，组成突击队，决定奇袭敌穴抓获敌人，以人换人的办法换回来被抓走的群众，准备就绪后，于5月29日晚，到董村以西抓了9名土顽头头的眷属。果然，机动总队慌了手脚，托7名说客找武工队说合，我尉洧县县长郝矩（现任四川省省长）亲自接见来人，提出4项谈判条件，迫使机动总队放回被抓去的群众，赔偿战斗损失手枪子弹500发，步枪子弹2000发和手枪2支。

1948年6月开封第一次解放，武工队的根据地日益巩固。除组织大量民工、担架支援前线外，还经常西进，扩大活动范围。从1948年2月到10月，武工队在和尚桥以东的新区活动70余次，抓捕地主、恶霸50余人，11月在长葛城建立长洧县人民民主政府，王加奇任城关区代区长（现开封市水利局离休干部）。12月恢复长葛县建制，武工队队员一部分调到洧川县大队，一部分留在长葛县和尚桥区。至此，这支原尉洧县领导的武工队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

中南军区的模范连——长葛县干队

魏昭聪

长葛县干队的前身是长葛县武装大队。

建国前后的县大队，在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中，是长葛人民的功臣部队，建国初期的一九五〇年，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号召全军开展“大生产运动”，用全军指战员的实际行动，劳动生产，增加收入，减轻人民负担，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庆节。命令下达以后，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全国迅猛展开，长葛县大队更是干劲倍增，他们作出具体实施方案：一、不与农民争土地，忠诚地完成保卫土改、保卫农民斗争成果的光荣任务；二、大力减轻政府负担，自力更生搞好部队建设；三、搞好军政训练，继续向兄弟部队输送优秀兵员。为贯彻这项方案的实施，县大队的领导，的确费尽了苦心。

当时县大队有两名特别能干的领导，一个是大队长智希圣同志，他参军于一九三八年，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中滚打出来的老功臣，他始终怀着一颗对祖国，对人民赤诚的耿耿忠心——党指到哪里就战斗在哪里；另一位是管理员兼大队会计陈印卿（又名陈鸿欣，长葛老城镇和平街人），此人从小是个孤儿，从生活中锻炼出特别能吃苦耐劳的坚强性格。参军以后，倍感人民军队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因而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

当时的县大队没有集体财产，只有战时供大队长骑坐的一匹战马。智希圣同志首先向部队献出了跟随自己多年心爱的“宝马”，让它为大生产服务。陈印卿同志跑到长葛驻军22师师部，讨要了他们废置不用的一部旧胶轮大车，经战士们七手八脚的修理，使这部破车能够开始转动。陈印卿又回家卖掉了自己的破桌凳、旧家具，许多战士也捐出了微薄的津贴（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官兵都没有工资）。众人凑钱又买了一头几乎不会立站的瘦骡子，经过精心喂养，使瘦骡子焕发“青春”，后来成了架车的主角，一骡一马一辆破车，就是县大队在大生产中起家的老本钱，他们初步组成了大车运输队。

搞运输还得有资金，钱从哪里来？众人拾柴火焰高，战士们自己出主意，把每人的菜金扣发一星期，作为运输成本。这一星期，三个连、四个区

干队、五六百人，以挖野菜，煮黄豆度过了难关，当时部队的艰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搞运输拉什么？他们首先考虑的还是人民利益，解放前长葛半数以上农民吃不到食盐，初解放，也不可能有很大的改变，许多农民仍靠土法制作的小盐（硝盐）度日。吃那种盐会促使百病横生，政府为打开食盐进口渠道，也正在千方百计筹措，运输队成立后的第一趟，就是奔赴开封盐区拉盐，当第一车海盐拉回来时，县工商科的领导亲自迎出城外数里，拉着陈印卿等同志的手，掉下了感激的热泪。路子走对了！就理直气壮地继续干下去。于是他们不顾疲劳，第二天一早继续登程，起早贪黑，急人民之所急，想政府之所想，一趟又一趟地为长葛人民办好事。经过一段努力，也初步为部队积累了部分资金。

有了钱，许多事情也比较好办了，这时大队把精力集中在减轻政府负担和改善部队生活上。旧社会长葛地瘠民贫，全县生产的粮食不够本县食用，加上苛捐杂税，人民被逼得逃荒要饭，卖儿卖女者，年年有之。解放后经过土改，情况虽有所好转，但穷困面貌尚不能一下改变，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部队及时开展大生产运动，其意义是相当重大的。县大队到处寻找小片荒地，不与农民争可耕地。护城河里侧的寨唇，是多少年的荒片，战士们就起早贪黑开垦，使那些不毛之地，变成了蔬菜和粮食基地，用开荒种菜节省下来的菜金改善部队生活，把种粮节省下来的口粮交还给国库，完全体现了人民子弟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长葛食盐供应得到部分缓解以后，运输队又把精力转向运输粮食和油料上。豫东南是河南的粮仓，相比之下比较富裕，运输队就把目标转向上蔡、西平、遂平等县。我县城关各界，许多单位都得到过运输队接济的油料。也就是说运输工作不但改善了县大队自身的生活，同时也为许多兄弟单位办了好事，受到县委、县政府的多次表扬。

陈印卿不但能为连队出谋划策，而且总是身先士卒，身体力行、吃苦在前，舍己为人。一九五〇年冬，他累得病倒了，但一听说运输大车被困在遂平县的雪沟里时，便奋不顾身、亲自前往解救。当时是狂风呼啸，大雪纷纷，滴水成冰，积雪没膝的时候，他用破褥子包住头，手拄拐杖，踉踉跄跄，半爬半走的奔到了和尚桥火车站。可是没有南下的客车，他就不顾狂风大雪，毅然爬上敞蓬货车，到达遂平时，手脚都已冻僵，就连爬带滚，硬是找着了大车，并设法将一车芝麻安全运抵长葛。陈印卿同志的身上，至今残留着冻坏的伤疤。身经百战的大队长智希圣，在战场上没有掉过泪，但被陈印卿忠心耿耿为连队吃大苦、耐大劳的忠勇行为，感动得热泪纵横。县委书记马云生同志拉着陈印卿百般抚慰，还号召县直机关干部向陈印卿学习。在

县领导和同志们的鼓励下，老陈更加兢兢业业，刻苦努力，为县干队的建设，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一九五〇年九月，县大队进行了整编，大部分同志升编到野战部队，县里仅留下了一个加强连，改名“长葛县干队”，智希圣仍任队长，陈印卿又加了一个头衔——兼任管理排长。

通过一年连续不断地辗转运输和指战员身体力行地生产劳动，连队面貌彻底改观。一百五六十名的县干队，完全吃上了细粮（当时规定30%细粮、70%粗粮），节约下来的粗粮全部上交给政府，减轻了国家的负担。这在当时中南军区所属的六个省军区（两广，两湖、江西、河南）的百万部队中，实属首创。但他们并不满足于这点成绩，他们有更高的目标，那就是要把长葛县干队建设成为第一流的先进连队。为此，在后勤保障上，确实下了很大功夫。

一、大抓伙食改善，以提高身体素质。他们从战士中，民主选出“士兵委员会”，专管连队生活。又从全队挑选出精明强干、热心为战士服务、且懂得一些烹调技术的青年，组成了炊事班。这些同志刻苦锻炼，在实干中学，炊事技术飞速发展，士兵委员会每天搜集他们中的好人好事，在晚点名时，在黑板报上，及时宣扬他们的事迹，造成了一种人人钻技术，个个争先进、讲团结、比贡献的良好气氛，进而推动了全队的高涨士气。士兵委员会还在征求全队意见的基础上，拟定每周每顿饭的“食谱”，并公布于众，取得人人监督，管理排长陈印卿就按照食谱上的规定，精打细算，按质保量去购买食品，使每个战士每顿饭都能吃上二至四种菜，战士们每人发给两个碗，一双筷子，一个汤匙，实行“份餐制”，菜定量，主食不限。当年后季，完全达到军委规定的荤菜为主、素菜为辅的生活标准。士兵委员会当时还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每顿分给战士的各种菜肴，如无特殊理由，不经批准者，必须当顿吃完。“逼”着吃好吃饱。后来竟出现吃一次素菜，战士就象改善生活一样爱吃。生活好了，人人红光满面，个个精神焕发，从而推动了各项训练任务顺利完成。后勤工作确实起到了保障作用，受到省军区、军分区的多次表扬。

县干队有个卫生室，负责战士看病，从五一年冬到五二年冬，一年之中几乎没有出现过病号，卫生室的医生只好“改行”！变成了防疫员，把主要精力放在环境卫生和防病上。长葛县干队整年不到军区去领药品，是全省医药开支最少的单位。

二、搞好环境卫生和美化环境。生活的充分改善，指战员精力充沛，上

下一心，群策群力，在环境卫生方面，也创造了意想不到的营房美境。

居住环境。长葛县干队住在城内吕祖阁中。吕祖阁是一个庙宇，在城的东南角，东、南两面临近城墙，山门前是一片松柏林，战士们从山门起，向南到城墙根，铺了一条约一丈宽的路，松柏林修理平平整整；把城墙劈成三层的台阶，每层都种上各种花草，变成了一个立体式花园，鲜花园绕着青松翠柏，一片幽雅，城墙的最上层是逊廊小道，面对隐隐约约中的庙宇山门，小径通幽，真使人心旷神怡，留恋忘返！谁也想不到这里会是大兵的营房！

吕祖阁是个两进的院子，前院原有个池塘，战士们在水池旁边种上许多红白相间的月季花，精心管理之下，月季花枝繁叶茂，枝条一直爬到房坡上，进了山门，满眼都是花，蜂蝶竞戏，溢香扑鼻。在建国初期；这种花园式的营房，在全国都少见到！吕祖阁的后院是伙房和战士住室，四周也都栽满了树木和花草，宁静肃穆。

长葛县历史上没有过自来水设备，而县干队却建起了土造自来水装置。庙院中有一口吃水井，他们在井旁垒了一个四方砖台，台上放置一口大砂缸。战士们从井里把水拔出来再倒入砂缸中，砂缸的底部安了一根竹竿（粗细约6—8厘米），从废品店中买了些破骑车里胎和细铁丝。把竹竿内的关节打通，把竹竿两头锯成榫，使一根根竹竿都能对接起来，接口处用破车胎包扎，再用细铁丝捆紧。自来水管就接成了，可以通到每个需要用水的地方。原来规定各班轮流值日，负责向砂缸内打水，但战士们热情很高，许多人偷偷地自动抢着打水，水缸里总满满的，“无名英雄”遍布全队。在许昌军分区所属十三个县干队及独立营中，长葛县干队是唯一用上自来水的单位。有了自来水，战士们在跌、打、滚、爬的严格军事训练中，很方便的就可得到冲洗，部队卫生状况迅速改观，在上级多次组织的内务检查中。长葛县干队总是名列榜首。

清洁卫生的伙房。伙房周围的地面、墙壁、树木、花草以及伙房内的地面、墙角，每天消毒一次；菜案、面箱、水缸都用纱罩罩严，炉灶有烟囱把烟尘导向室外，连拔气的天窗，也蒙上了纱帘，伙房的门口吊有竹帘，蚊蝇根本进不了伙房，老鼠被彻底消灭，室内连蒸气都无法存留。个人卫生方面：炊事员人人穿工作服上岗，一天换洗一次，进伙房还必须戴口罩、穿袜子，半个月理一次发，一天剪一次指甲，三个月进行一次身体检查，有病者根本不能进伙房。由士兵委员会协同卫生室负责检查，真正作到持之以恒，这个最讲卫生、饭菜质量达到军委规定标准的伙房，是中南军区检查组核查后最为满意的基层伙房，并被省军区命名为“模范炊事班”。

无蚊蝇、无臭味、无蛆虫的厕所。战士们自己动手，沿东城墙根搭盖了一座长 20 米的室内厕所。大小便池都是用三合土（石灰，炉渣，胶泥）砸成的。自来水能冲洗各个便池，厕所的门挂有竹帘，其他窗口蒙有纱布，粪便排污池盖上盖，顺着城墙根向城外挖了一条沟，用砖砌好，使粪便自动冲到城外，再用这些粪便作种粮种菜肥料。厕所内每天喷洒一次药，所以厕所内找不到蚊蝇蛆虫，闻不到臭味。由于全队干部、战士自觉地通力合作，把后勤保障工作赶在了部队军政训练的前面，舒适的生活及优美的环境，已成为战士理想的学习园地，从而迸发出高度的革命热情，上级下达的各种训练项目，每次都完成的十分出色，不断受到表扬。如上级曾三次从该队抽调特种兵，最多的一次竟抽调六人，到省军区和中南军区，经过严格的体格检查和政治审查，长葛县于队没有一人一次因体力不合格被筛选掉的。

中南军区和河南省军区，为了切实验收长葛县干队是不是达全军一级连队标准，曾于 1951 年两次派工作组亲临长葛现场实地考察。第一次是军政训练验收，由中南军区训练部偕省军区、军分区主管训练的人员，在长葛经过半个多月的考察，认为完全符合内务条例（当时执行的是仿苏军条例）和政治工作条例的规定，肯定了长葛训练的优异成绩。接着第二次又派中南军区卫生处的朱处长，并组织省军区、军分区的医生、营养护士，到长葛蹲点三个月，对每天每顿饭的各种表现，都作了详细记载。认为战士每天的饭食，都达到了军委所规定应该摄取的热量卡，且干净卫生。对每个战士作了三次以上的体格检查，认为长葛是最好的兵源基地，完全符合国家一级连队标准。对营区环境、卫生防疫措施，认为不但达标且有许多创新。经过两次详细评查，又与中南军区和数万连队比较，最后确定：河南军区长葛县干队为中南军区模范连。在中南军区司、政、后的嘉奖令中，名列第二，由许昌军分区副令员兼参谋长信俊杰同志，代表模范单位，亲往武汉受奖。

（作者魏昭聪，长葛县人，1948 年参军，原在许昌军分区政治部工作，后在长葛市商业局工作）

原国民党郑州专署保安第三团起义前后

——纪念原国民党郑州专署保安第三团起义五十周年

郑云龙

原国民党郑州专署保安第三团（以下称保三团），在团长张惠民的率领下，于1948年10月14日，在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宣布起义。同月8日在豫皖苏五分区所在地鄢陵城举行起义欢迎仪式。同月25日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豫皖苏军区五分区独立支队。从此保三团弃暗投明，走上了光明的革命道路，至今已整整50年了。保三团的光荣起义。不是自发的一帆风顺的，是在形势所迫，大势所趋和共产党的政策感召下，共产党和解放军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反复曲折斗争的结果。现将我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斗争经过事实和起义后，党改造旧军队政策的强大威力，以及该团起义参加革命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为革命和建设所发挥的作用及贡献，写成这个概要的回忆，献给在革命战争和建设祖国为人民壮烈牺牲的战友烈士，以资纪念。

一、保三团的基本情况

机构规模及名称演变概况：保三团，原系日伪时期平汉铁路（现京广路）长葛段的护路大队。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将其改编为长葛县民众自卫大队，马益谦任大队长，下属两个中队，一中队队长张殿卿（长葛九牛站人）、二中队队长李永祥（长葛芦庄人）。不久国民党郑州专署专员王光临，任其有私交的杨德（长葛赵楼人）充任大队长。马益谦改任军事科长。1946年7月李乐安出任国民党长葛县县长后，将长葛县民众自卫大队，扩编为长葛县民众自卫总队。李乐安兼任总队长，副总队长赵完若，总队副杨欲己。下属一个直属自卫大队，杨德任大队长，赵亮功任大队副兼指导员。大队下属四个中队，一中队队长张殿卿，二中队队长李永祥，三中队队长王洪章（河南巩县人），四中队队长李林汉（河南南阳人）。另有一个警察中队直属总队部，中队长由警察局长梁敬宇（河北冀县人）兼任。在全县十二个乡镇组建了十二个不脱产的机动中队，由各乡镇队副兼任中队队长，直归总队部指挥。

1947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刘邓大军渡黄河南下，跃进大别山，陈谢

兵团出击豫西。李乐安十分恐慌，急忙令各乡镇的机动中队调集县城，新建两个机动大队。聘请退伍在乡的原冯玉祥旧部军官张惠民（长葛大绳赵人）出任大队长，谷耀宗（长葛付桥人）任副大队长。原直属自卫大队长杨德改任第二机动大队长，张殿卿升任直属自卫队长兼自卫一中队长。同原有直属自卫大队合称为长葛县民众自卫机动总队。仍由李乐安兼任总队长，赵完若任副总队长，杨欲己任总队副。1948年秋济南解放后，中原也处于拉锯战局，长葛县民众自卫机动总队受到打击后，不敢回长葛，长期逃在郑州、新郑、中牟、密县等交界地区流窜。为了作垂死挣扎和便于在当地派粮派饭吃，经郑州专署批准，将长葛县民众自卫机动总队改名为“河南省郑州专署保安第三团。”

人事概况：军官主要分为两部分或两个派系，即一是外来派，二是本地派。外来派多是军校学生，省、专委派或在乡军官和总队级军官的亲信亲属等，有学历，根子硬，掌握着军队的实际大权。如李乐安，河南巩县人，据说同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茂恩有亲戚，日本早稻田大学生，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上校政治教官。副总队长赵完若，密县人，专署委派的中校军官。主管全总队的政治工作大权。新来姓李的总队副，专署委派的军校少校教官，主管全总队的军训大权。梁敬宇，河北冀县人，是专署委派的警校出身的少校警官，掌握着全县的警察治安大权。总队部的军需官刘禄斋，河南巩县人，李乐安的亲信，掌握着全总队的后勤物资供应大权。直属三中队队长王洪章，巩县人，李乐安的亲信，直属自卫大队副李景云（也叫李乐云）是李乐安的堂弟，直属四中队队长李林汉，机动中队长张祥增，均是南阳人，是杨欲己的亲信，这些人均掌握部分军权。分队长以下人员中也有部分是外地人，大部是同总队军官有上下级或乡亲、裙带关系等才来长葛当兵任职的。

地方军官，多属于草莽恶霸，拉杆子出身干起来的，或地方乡绅等收罗乡亲形成的一般势力而被地方政府利用起来的，无什么学历及后台。但是一股地方恶势力，他们拉帮结派，各霸一方，把自己所掌管的部分军权当作自己的地盘发展势力，把所管的士兵当作自己的家奴使唤。如杨德是恶霸拉杆子出身的草莽，因同郑州专员王光临相识被任为大队长。宋宪彬，长葛石象人，恶霸拉杆子出身，1946年冬还是李乐安通缉的对象，因仇共及杀人不眨眼，被李乐安利用反共抗共。张殿卿，李永祥靠青帮在地方拉了一股势力并长期盘踞着长葛自卫队的宝座。他们的士兵一是自己本乡亲属关系，二是青帮师徒关系。当时长葛青帮有三个派系即“江淮泗”，“二五六”，“嘉海

卫”。奉翁（德惠）、钱（德正）、潘德林）等三个青帮创始人各自帮派的祖师爷。翁、钱、潘三人系明末清初时运河上的运粮官，又是拜把弟兄。1947年春节期间，自卫一中队长张殿卿（青帮嘉海卫帮廿三辈弟子），开山门收弟子200余人，大都是本中队及警察中队的官兵和西门大街商界的名流。如西街布行的老板孟友才（大孟人），就是张殿卿的都老大（大徒弟）。青帮三派之间互相支持配合利用，如这一派开山门收徒弟，另两派头子就分别当“引进师”（介绍人），“传道师”（宣传帮教规）。但又互相抵制排斥，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各霸一方，称王称霸。

排以下人员，有的是国民党退伍还乡的行伍军人，在城镇的无业可就，在农村的不愿吃苦耐劳，因此就到自卫队找个职业，混碗饭吃。但大多数是穷苦人民的子弟，因为生活所迫，或逃避兵役（正规军打仗有危险，地方兵安全）而出来到自卫队当兵的。也有少数是同军官有乡亲、亲属、裙带关系，及地富子弟为求一官半职来当兵的。也有极少数地痞、兵痞，混世魔王的兵混子等。保三团原为一千多人的军队，为什么起义时只有七百多人呢？除了在拉锯战斗中被解放军消灭俘虏走部分外，另有两种情况：一是贫苦劳动人民子弟出身的士兵，不愿为国民党卖命而脱离部队回家另谋生计去了。二是自卫队在流窜中吃不了苦的富户子弟士兵逃离部队回家了。

二、李乐安扩军备战，为蒋家殉葬送终

自1946年7月至1947年7月，李乐安出任国民党长葛县长，仅在暂短的一年时间中，把仅有两个中队300余人的长葛自卫大队，扩充发展到具有16个中队一千四百多人的自卫机动总队。同时利用长葛人民的血汗钱，在外地购置了大量较新式的武器、被褥，装备这支反人民的地方武装。在扩充军队的同时积极备战，征派了大量的民工，在县城各门口、各街道口，以及城墙内外周围，修筑了无数的地堡、暗堡、地道等各种防御工事。在全县各地砍伐了大量树木运至县城，在县城墙周围的海河（护城河）外栽了一层木桩，筑成一道外廓木城。还在和尚桥溷水河桥上加闸，提高水位，引水灌满了县城周围的护城河。妄图以此阻挡解放军解放长葛城。尽管李乐安等人费尽了心机，花费了大量长葛人民的财物，作了那么多的应战准备，长葛自卫总队还是不堪一击。1947年12月解放军第一次解放长葛时，自卫总队溃不成军、弃城而逃。1948年2月在董村和同年6月在郑州南曹镇等地，几度遭解放军打击，几乎被歼。李乐安魂丧胆飞流亡郑州再也没敢回长葛。随着战争的发展，蒋家王朝被战争的烈火彻底埋葬，李乐安最后也受到人民的惩办，为蒋家王朝殉葬送终了。

三、张惠民受党指示，保存实力待机起义

据保三团原机动大队长张益民，生前于1985年2月的一篇回忆中记载，芮文彩（芮培华）为保三团的起义曾三次来长葛。第一次是1947年秋后的10月，以商人探友的身份，在长葛城西关（现老城镇）国民党长葛县政府科长顾呈样家同张惠民会见（张、顾、芮三人早在冯玉祥部时就相识）。当时只作了寒暄问候和透露了解放军五分区争取长葛自卫总队的意图，未详谈。第二次是1948年春，在长葛城北10多里的某村的张惠民机动大队部相会，这次畅谈了国内战争形势和长葛自卫总队内部的人事情况，部队情绪等。同时明确传达了五分区党的指示，要求张惠民努力工作，分化瓦解敌对势力，团结一切可以争取的进步力量，抓势夺权，尽一切努力和办法保存现有实力，待机起义，并期待起义成功。第三次是1948年5月底，这时长葛自卫总队恰回长葛，在长葛城内路家坑边机动大队部张惠民的家相会。芮同着众人，以战争荒乱，做生意赔垮，生活无门，找老朋友避难谋生为由和身份在机动大队落脚栖身。从张益民回忆中的芮文彩来机动大队栖身谋生，实际上是解放军豫皖苏五分区党组织和分区司令部，派遣到保三团的联络员，协助张惠民策划实施起义计划。同时张惠民通过芮文彩也同中国共产党豫皖苏五分区党委和分区王发祥副司令员直接取得了联系，接受党的直接领导和指示。从此，争取保三团起义的工作，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积极而有序地进行着各项准备工作。

根据党对张惠民“抓势夺权，分化敌对势力，争取进步力量，保存实力，待机起义”的指示精神的三句话，内容很广，份量很重。夺谁的权，分化谁，争取谁，怎样保存实力，怎样夺权，什么时候时机成熟等等，需要认真分析研究，具体筹划安排和实施的措施，还必须是秘密进行，不能打草惊蛇。

当时我是下层人员而且又不在机动大队工作，不可能知道这些具体情况，甚至连风声也未听到。但是从保三团人事的基本情况和后来在实际斗争现象来看，不言而喻，夺外来军官的权，分化本地军官，争取下级军官及广大士兵。贯彻实施分区对保三团起义的五条方针（五句话），从后来的行动看，夺权，保存实力是重点，是要害。因为夺了权保存住了实力，对于分化本地军官和争取广大士兵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外来军官是起义的最大障碍和阻力，他们是国民党反动派忠实走卒，顽固地坚持反人民的立场。他们掌管着保三团命运的大权。从李乐安的扩军备战，和拉锯战中，保三团几度几乎遭歼，甚至周围各县自卫队被解放军歼灭殆尽，保三团成了孤军还逃到郑州周围，东躲西藏，妄图依靠郑州国民党残军为靠山而苟延残喘，等待所谓

“美国出兵，蒋介石反攻”的梦想。由此可见，外来军官是与人民为敌到底的顽固派，不打倒驱逐他们，夺了他们掌管保三团的大权，保三团起义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设法打倒驱逐他们。地方军官是地方的恶势力，但他们在本本地有地盘、有家小，打起仗来怕打烂自己家中的坛坛罐罐，无家可归。因此他们也欢迎和平解决，不打仗，对起义也有赞成的一面。但也有少数人怕失掉地盘，起义后不能再称王称霸，因此也有不赞成起义的一面。所以对这部分人需做工作进行分化瓦解。对广大士兵，大多数来自贫苦劳动人民家庭，并且在拉锯战中也看到我们政策宣传的标语，和听到回来的被俘人员讲述解放军的政策。古语说“兵随将转”，因此在讲明起义的政策和意义后，他们不愿再为国民党卖命，而转向赞成起义的，应大力争取，关键问题是怎样夺外来军官的权和保存实力的问题，两者不能分割，必须紧密结合，互相促进。既夺外来军官的权，又保存保三团的实力，两者如何结合进行，从我的亲身经历认为：解放军政治、军事双管齐下，在政治上孤立和保存保三团的策略，自1947年12月至1948年6月周围各县的自卫队先后均被消灭，唯有长葛自卫总队未被消灭，但已是无家可归的孤军了，处境十分危险，士兵们担心害怕、惶恐终日、不知哪一天被消灭。但也庆幸自己，认为长葛自卫队狡猾、运气好。殊不知这正是解放军的政治策略。通过张惠民针对赵完若怕死怕被消灭的心理向其提出避战的方法：“共军来了，我们就走，共军走了我们再回来。”当时我也曾听到张殿卿对班以上干部讲过。“我们对付八路的办法是，他们来了，我们就走，他们走了，我们就回来。”这是从保三团内部实施的保存实力的策略，李乐安、赵完若也乐意接受并认为张惠民是为他们着想，是忠诚可靠的朋友。因此后来下台时，也将大权交给张惠民。这个策略给后来张惠民夺权打下了政治基础。从此长葛自卫总队每次窜回长葛，要钱粮时都是白天来夜晚走，不敢在长葛宿营，而撤到双洎河佛耳岗以北的秋庄、申庄、李良店或河西官亭一带宿营，闻到解放军来的风声就向新郑方向逃窜。在军事上是解放军对保三团既穷追不舍，又围而不攻，追而不歼，截而不击的战术。只是把保三团打乱，溃不成军，每次都是几乎差一点被消灭而未被消灭。使上层反动军官恐慌不安，感到随时都有被歼灭，被打死生命危险，因此不敢再在保三团待下去了。或打了败仗，无脸面再在保三团干下去了，就辞官不做，或不辞而别，逃离保三团。这种策略，既用军事手段迫使外来上层反动军官交权或丢权离开保三团，也保存了保三团的建制和实力。同时也分化了地方军官，争取了广大士兵和创造了保三团起义的条件及时机。且看以下具体事实经过。

四、自卫总队不战，弃城而逃，解放军寻战，围而不攻，截而不击。

1947年12月13日解放军华野三纵九师第一次解放长葛时，就是围而不攻，截而不击的战术吓跑并跑乱了长葛自卫总队，当时长葛自卫总队，除直属自卫大队李林汉（南阳人）的四中队，配合国民党交警队一个中队驻守和尚桥车站外，全部驻守长葛老城。解放军华野三纵九师25团，由老城东南两面包围长葛城，只包围而不攻。27团由老城北向西南方向前进，破击官亭和尚桥间的铁路并相机攻占和尚桥车站。当时李乐安、赵完若等得悉解放军来围攻长葛之情报后，即令张惠民大队于12月13日下午出城到城东迎击解放军。其余全部人马于下午五时左右集中在西门里大街及南城巷待命，听候张惠民的命令。但候至晚10点左右城东无动静（解放后才知张惠民大队出城后过双泊河向北而去，并未迎击解放军），此时李乐安、赵完若怕夜长梦多，便命部队出城西逃，因行动仓促慌忙，行至西关大街岔口处，“啪”的一声枪响，部队顿时乱了队，当官的喊卧倒，部队全部趴下，片刻无动静，查明是一士兵枪走火后部队继续西逃，但行到大户陈、坡岳、东贾庄等三角地带的开阔地时，被老城北来的解放军27团截住了，突然从北边高喊一声“哪一部份？口令？”听口音是山东大汉声音，知道是遇上解放军了，这时自卫总队虽乱而无乱跑，只是由一路纵队变成多路纵队，无声无音的争先恐后没命地向西逃跑。这时解放军也未开枪，只是由东北向西南切断了向西逃跑的自卫总队并俘走了部分士兵。自卫总队一口气向西跑了十多里至铁路西的杨寨南门外路上，停止休息喘气。整理队伍清理人数时，张殿卿的一中队三分队王福昌、九班长田群成及士兵十多人被解放军俘去。这时和尚桥车站的战斗已打响，国民党驻和尚桥的交警中队及自卫总队直属四中队，被解放军全部消灭。西逃的自卫总队，天明跑到后河白寨吃饭，饭后继续西逃至长葛、禹县交界处的水磨河镇，待了近一个月，解放军完成任务转移走后，李乐安、赵完若才带着自己总队，回到长葛县城。但是日夜胆战心惊。尤其经1948年2月解放军五分区28团的一次沉重打击后，长葛自卫总队便再不敢在长葛城久住了，便开始了长期在新郑以北一带的流窜生活。同时，经过和尚桥第一次解放战斗，南阳系的李林汉中队被消灭后，虽李林汉乘黑夜只身逃出，但自此以后南阳派军官总队副杨欲己及李林汉等人消失再没露面了。这部份势力被挤出了长葛自卫总队。

五、南曹镇各县土顽被歼，李乐安魂飞逃郑州

1948年6月解放开封前夕，长葛、许昌、临颍、鄢陵、尉氏、洧川、新郑等县，自卫队残部猬集在郑州东南约30多华里的南曹镇（寨）一带，

妄图依靠国民党郑州驻军苟延残喘。这次解放军对长葛自卫机动总队是采取的孤立、追而不击的策略。当时是解放军华东野战军（陈粟大军）的三纵、八纵于6月17日包围开封，22日解放开封。解放军西路的打援部队是中野九纵（刘邓大军秦基伟纵队）及豫皖苏军区部队，任务是攻占中牟阻击郑州出来东援开封之国民党军队。于6月19日解放军西路打援部队由南而北路经南曹，将各县地方武装包围于南曹全歼，唯有长葛及鄢陵的少部份逃脱向郑州方向逃跑。

当时情况是，长葛自卫总队驻南曹西半部，其他保安团住东半部及以东以南的村庄。19日下午，我在南曹西门外南边约半华里的几户人家设军士哨，监视南面情况，约晚八时左右，中队部通知我撤哨，因哨兵很分散，撤完回中队晚了点时间，中队长张殿卿说我慢腾腾还骂了我一顿。这时长葛自卫总队全部集合在南曹镇西门外待命，直坐到晚十一点，也不说走，大家都有点瞌睡打盹。这时突然东南两个方向枪声大作，大家被惊醒，总队部命令向郑州方向（西北方向）走。部队也未集合，以中队为单位，也未成队成路，各拥向西北郑州方向逃跑。在大枣林中急不择路，乱窜，狂奔，也不分官兵和行军次序，只是各班招呼各班人一块跑，狼狈相难以形容，鞋跑掉，衣服挂破，扔东西物件的不计其数。刚离南曹时解放军的枪声在我们后边嘎嘎直叫，子弹在我们头顶上嗖嗖直飞。跑有约十里开外就无枪声了。但自卫总队的惊魂仍未定，逃跑仍未停止。跑到天明，张殿卿同我们一路跑，当见到李乐安、赵完若和总队部人，还在我们后边时，便大声喊叫李清堂分队占领一个沙包（沙岭），掩护总队部到前边，我们尚未到达沙包上，李、赵及总队部人马便落荒而逃。此时张殿卿头一摆，说：“走！便跟随总队部后边，继续急进（这时无枪声，由跑转为急步前进）。逃到郑州城郊时，国民党驻郑的孙元良部的巡逻坦克车围着郑州来往不断地巡逻着，这叫自卫总队魂魄稍定，停下来休息。驻军不准杂牌兵进城，经交涉允许李乐安进城，赵完若率部队绕城到郑州西北的南阳小车站附近休息，找饭吃。驻一天后，由南阳站经郑州西，南下至郑州、密县交界处——赵完若的家乡一带，流窜躲藏讨饭吃。

经过这次毁灭性的打击，李乐安真吓破了胆，从此躲藏在郑州再没敢返回长葛了。李乐安的亲信、王洪章（巩县人）的直属三中队在尉氏县守黄河，在解放开封战役中被消灭。从此巩县派的外来军官及亲随势力也销声匿迹地离开了长葛自卫机动总队。只有赵完若的密县派，还仗着郑、密交界还有点活动小天地，活动在郑州、密县、新郑三县交界处，继续作垂死挣扎。